

贵州民族建筑的历史解读^{*1}

麻勇斌

【摘要】:贵州民族建筑极富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它的外在之美多存在于形态,内在价值多存在于历史。它蕴藏的历史信息主要特点是:大型建筑与民族治理政权存在对应关系,村寨规模与民居精美程度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对应关系,保存较为完好的规模较大村寨与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存在对应关系;民居形态深受蜀、湘、浙、徽等区域民居建筑的影响;民族村寨的选址映射着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少数民族的生存境况;规模较小又不在水道和驿道沿线的民族村寨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历史事件的深刻影响;嵌入性的民族村寨是某些重大历史的“事件锁定”;作为危时存身的山屯洞堡,与当地人文存在密切关系。贵州民族建筑发展史有四个重要的时期。

【关键词】:民族建筑;历史;国家战略;对应关系;事件锁定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18)01—0029—15

一、引言

贵州民族建筑,不论是雷公山、月亮山的苗族、侗族吊脚楼,还是黔中地区的布依族、屯堡人石板房,也不论是民居单体,还是院落、聚落和城堡,都极富美感,极具个性,令人印象深刻,因而多年来颇受“外部视角”的高度关注,同时广泛引起“内部视角”的由衷自豪。但是,无论是“文化他者”出自镜头画面的感动,还是“文化持有者”的出自他者盛誉的自爱,大都没有实现真正的阅读和理解。关注者的目光通常集中在“空间与形式”或“文化与艺术”的层面,其所产生的读解体会,均是空间与形态直接导致的触动和联想。对于贵州民族建筑来说,这样的读解是片面的。民族建筑与民族历史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借助历史的视角,将“文化他者”和“文化持有者”的目光协调到贵州民族建筑孕生发展的历史视角来,使之能够触及相关的宏观背景与微观故事,比如贵州民族建筑建造者和使用者个人、群体、地方政权、国家政权等主客观因素在民居、聚落、城堡的建造过程、使用过程中直接、间接的影响,为“深度认知”储备必要的信息。这是解读贵州民族建筑文化之关系与逻辑的关键。

笔者对贵州民族建筑尤其是苗族建筑进行过将近20年的实地调查和长时间研究,大体认为:历史的价值,可能是贵州民族建筑遗产价值的主轴;民族建筑的历史价值,不在于时间的久远,而在于建筑活动被历史深刻影响的同时,忠实地镌刻着历史的印记;只有读懂贵州民族建筑中的历史信息,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贵州民族建筑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独特性;贵州民族建筑的历史信息,从建筑文化艺术的视角是无法被发现和读解的,必须站在历史的视角,将地方史志资料,同当地人对其村寨、集镇、城堡的记述资料进行相互参照,并佐以大量实地调查的案例,才能发现线索并弄清经纬。

二、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信息

贵州民族建筑蕴含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信息,可以归纳为三个对应关系。

(一)大型建筑与民族治理政权存在对应关系

¹作者麻勇斌,男,苗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贵州省黔学研究院执行院长、贵州三线建设研究院执行院长(贵州贵阳 550002)。

在贵州，无论是哪个地区和哪个民族，存在大型古建筑或古建筑遗址与否，是其在古代有无军事政治治理实体的重要标志。印证这一观点的实例有如下六个。

遵义的海龙囤。竣工于明末的海龙囤是孤峰绝顶之上的王城，已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印证的是播州杨氏土司延续 700 余年的少数民族治理政权的存在。其规模之大和工艺之精湛，在贵州实属罕见。经营海龙囤的杨氏土司之族属，虽然争论很大，几乎难以定论，但它作为唐宋兴起的羁縻州政权实体，跟苗族、彝族、仡佬族有密切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从建筑文化遗存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它更多与苗族(西部方言)和后来南迁的瑶族有关。理由有四：一是海龙囤建筑有强烈的东方情结。海龙囤所在的这座山，跟“大海”没有什么关系。但从这座城堡的命名来看，它的主人有着强烈的东方情结和关于海的念想。这可能是它的主人背负着某些强烈的与族群命运紧密相连的精神追求。屯城内部的“王宫”全部朝向东方，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里面，亚鲁王的父亲总问一个问题：“远方是什么？”并派雄鹰去探问，得到回答：“远方是大海。”亚鲁王历经无数艰辛立国后，同样问“远方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派出儿子东征。还有，亚鲁王率众迁徙的过程中，曾在一个叫作“青蛇”的地方居住过并杀死“青蛇”，后经过占卜认为不宜久居，才迁走了。海龙囤 40 公里外有青蛇屯。这些都与苗族的尚东情结和群体记忆保持惊人的一致。二是海龙囤的总体布局和内部空间的使用，有强烈的“崇尚尚险”观念和“尊左意识”。“老王宫”和“新王宫”差不多在同一等高线上，“新王宫”的背后是一面比较宽阔的缓坡。“新王宫”完全可以往后退移 50 米左右，使得宫殿前面的院坝更宽一些，进入宫殿的甬道稍长一些，宫殿的王者之气更足一些。“新王宫”与“老王宫”同向和在相同的等高线上，似乎说明，“新王宫”的主人遵从一种择地原则：不越过祖先居住地的高度是对祖先的基本尊重。如果是这样，则在播州土司秉持的建筑文化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元逻辑：居高为贵。“老王宫”在“新王宫”的左侧，土司官起居的空间在大殿的左侧。这些内容，是苗族建筑一直遵循的重要逻辑，是跟原始巢居的知识丛结、方位信仰有关的逻辑。三是建造和使用海龙囤的播州土司，赋予海龙囤整个山体和建筑的含义是“巢”，因此，位于山脚的两个关隘被视为“立柱”，命名为“铜柱关”和“铁柱关”；在山腰设置“三十六阶天梯”，象征土司官在“巢”等于在“天”，山顶屯城被赋予的含义是“天国之城”，与苗族群体记忆中的东方故地的神圣城堡形态特点相同；“飞凤关”在“飞虎关”“飞龙关”等上山关隘之上，用的显然是凤鸟崇拜的信仰逻辑；在苗族记忆中，最为强盛时，苗族居住的城堡有九个城门，这与海龙囤设九座关似乎也是一种神秘的暗合。

2. 毕节的“大定府九重衙”“纳雍乐治古城”“大屯土司庄园”等大型古建筑(遗址)。这些大型建筑，都是古代彝族大君、土司、土目的治所和居所，对应的是彝族从君王到土司再到土目，延续一定历史的政权存在。“大定府九重衙”遗址，在大方县鸡场区拢供公社九层生产队，占地面积 6000 多平方米。杨洪文《彝族建筑文化研究》记述：“遗址分为九层”，“第一层石墙大部完好，长 4 米，进深 25 米，高 3 米；第二层石基高 2.5 米，进深 20 米；第三层石基高 2 米，进深 20 米；第四层石基高 2 米，进深 13 米；第五层石基高 2 米，进深 13 米；第六层石基高 1.5 米，进深 15 米；第七层石基高 2 米，进深 15 米；第八层石基高 1.5 米，进深 15 米；第九层石基高 1 米，进深 5 米。九层之外，尚有侧室三排。”^{[1] 3}“纳雍乐治古城”位于纳雍县的乐治镇，现在遗址上建有一所小学校。“旧称卧这城。‘卧这’系彝语，‘卧’彝语意思为‘官’，‘这’彝语意思为住处或居所。两词合意为官之居所或官府。”“其建筑坐北朝南，布局为五重堂，四个院落，左右通道，占地 1 万平方米，院宇四周由长 1000 多米的石墙围绕。1985 年发现的瓦当是仿汉瓦当的卷筒式造型。现存宣慰府第的府门前有公候府衙前的照壁，长 22 米，高 2.5 米，厚 1.5 米，大门两侧尚有两间风火砖壁，高 5 米、长 22 米，墙体光滑……其中第五层原大殿的柱础保存较好，现存 2 个，均为 1 米见方，上面突出的圆面直径 0.6 米，柱础东西相距 11.4 米。”^{[1] 11}“彝族扯勒部大屯土司庄园”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屯乡大屯村，“整个庄园建筑群的建筑面积为 12000 平方米，占地 5000 余平方米，坐东向西，依山布局，逐级升高略呈长方形。庄园均四周用石料铺就墙基，用青砖砌成高约三至五米不同的墙垣，沿墙外砌高达八至十二米不等的土碉五座。”

[2] 61

3. 紫云南关屯、镇宁的大干丈山屯等。这些位于险要山上的大型建筑，说明布依族土司政权的存在。《贵州省志·文物志》载：“在紫云自治县城南 15 公里羊场乡南关屯。明初，布依族土司班克胜受领大柴山、水塘一带，为紫云最大的寨主。土司寨设南关屯。明万历二年(1574)，班氏后裔班应龙受封参将，率其子班朝恩(亦封参将)与南宁侯共同发兵远征云南，官受康佐长官司。今班氏土司寨尚存石门寨、石块垒砌。寨内石头屋多处屋基完好。寨外明代所修五尺路保留约 1 公里。”

4. 黔东南岑巩思阳古城、衙院，思南县老城，印江木黄司城，松桃平茶官寨等。这些大型建筑，对应田氏土司治理黔东南下 800 年的历史。田氏土司的后裔及其辖地之民，如今分成汉族、土家族、苗族等。

5. 黔中宋氏土司城。在贵阳、黔南等地，遗留有宋氏土司的不少司城，如开阳宋氏土司司城、瓮安宋氏土司司城、贵定宋氏土司的“七司八印”，印证的是宋氏土司政权长达数百年的存在。宋氏土司的后裔和辖地之民，有的认同于汉族，有的认同于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

6. 多处小土司官寨。在贵州，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治理范围较小的小土司，比如遵义的罗氏土司，松桃的吴氏土司、龙氏土司、石氏土司、杨氏土司，余庆敖溪的毛氏土司等小土司，在各自领地建造有司城或官寨。这些土司的后裔和辖地之民，有的认同于汉族，有的认同于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

(二)村寨规模与民居精美程度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对应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不论是哪个民族，规模大、建造精美的贵州民族村寨，基本上分布在两条线上：一是水路沿线，即沿江（沿溪）的岸边；二是驿道沿线。这是因为水路和驿道是最重要、最兴旺的交通线和运输线，国家和地方军政力量都在这两条线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为民众谋生、创富、安居提供较多机会。因此，这两条线上的重要节点，分布的民族村寨，必定是与官家形成良好关系的村寨，必定是有规模较大汉族村寨为邻的村寨，甚至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共处的村寨。这些民族村寨保存至今的百年以上的老宅子，记录着某代人或某几代人的传奇。

(三)保存较为完好的规模较大村寨与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存在对应关系

处在距离水道和驿道较远之地的规模较大的民族村寨，能够形成较大规模和保持较多的精美老宅，缘于特定历史铸就某种契机。比如，雷山的西江苗寨，如今已是贵州乃至全国有名的苗寨。其所以存在如此大的规模，主要原因在于清朝在黔东南强行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开辟了“苗疆六厅”，西江苗寨接受朝廷的政策，没有遭到朝廷的毁灭性打击，而后，这里涌现出了诸如梁聚五先生等智者贤达，引导地方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积极参与国家资源分配，促使寨子沿着较少波折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规模较大的保存较好的民族村寨，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精彩历史。

三、文化关系史的信息

蕴含在贵州民族建筑中的文化内容，是多种基质复合而成的。其中，既有本土原生的内容，也有外部传入的内容，而且，现在多见的一两百年前的民居、村落的形态方面的文化内容，更多是外部传入的。

(一)河姆渡“干栏式”建筑形态的母本及其他

贵州民族建筑，总体上以河姆渡“干栏式”建筑形态为根脉。《贵州省建筑志》说：“各少数民族的祖先，经过穴居和巢居阶段，而且延续时间较长，至今在省内南部山区，还可以看到在带形岩洞中两侧的住房，中间为行人通道，户间以树条或玉米秸秆间隔的穴居形式。兴义则戎乡至今尚有独户山洞人家，属边远山区。”^{[3] 278}进一步说，贵州木构民居，无论是吊脚楼，还是普通木屋，都是由“原始巢居”演化而成的建筑形态。“原始巢居是中国建筑之穿斗式结构的文化（技术与艺术）渊源。所谓‘构木为巢’，是原先‘住在树上’的南方古猿进化成为‘新人’的一种文化创造。”^{[4] 23}“中国巢居大约经历了如下几个文化发展阶段：单株树巢→多株（四株为多见）→干栏式巢居→穿斗式结构地面房舍。”^{[4] 24}这一历程，贵州侗族的独柱鼓楼，苗族、侗族、瑶族的四柱仓屯屋以及几十根立柱的木楼，都分别给予印证。“原始巢居始以植物（树木枝叶、藤蔓、茅草等）为材，待由‘干栏’式向穿斗式发展，又在植物材料之中，加入泥土（有时以黏土涂抹墙体）这一材料因素。”^{[4] 26}贵州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民居的竹编壁，是对这一现象的有力印证。

在贵州的多数民族村寨,民居中有合院建筑,这种形制的房屋可能是从中原传来的。“合院建筑是我国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型,发源于中原地区,随着中原文化向四周地区渗透、扩展而遍及大江南北。”^{[6] 72} 乐嘉藻说:“总而言之,古代居宅形式之考者,唯周时土寝之图,最为详备……但南方因竹木樵薪之便,已不用土,而用砖与木材。又因受巢居影响,而有两层之制。唯各部分相互之间,尚存周时土寝之遗意。至北方亦因经济之发展,亦多以砖代土墙,唯森林不茂,故用木材较少耳。而各部分相互之间,已不甚合于古代,而多用中古以后由东胡传来之四合之制矣。”^{[6] 20-21}

贵州民族建筑中,鼓楼、碉楼、屯楼之类以高耸体现其特殊功能的公共建筑,无论是形态还是功能,可能跟东部平原地区古代城邑多见的城阙、宝塔等公共建筑存在渊源关系。由于缺乏历史视角,上述公共建筑,有两种最为容易被理解为贵州的独创。一是侗族鼓楼,容易被认为是贵州侗族独创的建筑形态。但据黄才贵考证:“在侗族鼓楼中,建筑年代最早的是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1)的通道马田鼓楼的主楼,其次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从江增冲鼓楼)”,“鼓楼,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北朝时期的北齐(561—577)。”^{[7] 70} 二是苗族的屯楼,包括笔者,也曾认为这是贵州苗族尤其是松桃苗族的独创,因为其活态标本只出现在松桃的牛郎镇婆洞和中寨这两个苗寨。2017年3月30日,笔者在安徽淮南参观楚文化博物馆,看见楚都出土的被当地称作“戏楼”的“屯楼”陶屋,才猛然觉察到,苗族屯楼可能也是从苗族的东方故地传入贵州山地的。

(二) 蜀、湘、浙、徽等区域民居建筑的影响

巴蜀民居建筑对贵州民族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乌江流域。其中,遵义大部、铜仁西部所受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安顺中部、毕节和六盘水的部分区域,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今贵州的所谓“黔北民居”,在形态、结构上,与巴蜀民居几乎无异;二是遵义的丙安古镇、大同古镇,铜仁之乌江沿岸的临江集镇,叠垒在临江狭窄地带的干栏建筑,与过去四川的合江福宝场、石柱西沱、酉阳龚滩等,无论是依山就势营造的技法,还是民居簇拥所呈现出来的空间形态,可以说都是一脉相承的法式;三是石头碉楼,在建造位置的选择、外部造型和内部空间联系方式上,都与四川的碉房建筑明显存在关联性。贵州的石头碉楼,从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看,较为集中出现在安顺屯堡聚落,点状出现在毕节的大屯土司庄园、六盘水的岩脚古镇和铜仁松桃的张坝堰等。此种碉楼,可能不是贵州独创的建筑形式,可能是受四川尤其是川西北部羌族碉房建筑影响的建筑形式。石头碉楼之类建筑形态,是居住在海拔较高的藏羌彝民族的创造。季富政《巴蜀城镇与民居》说:“在住宅的边角特别建碉楼即为碉楼民居。据笔者多年调查,凡此类民居,住宅与碉楼有十分丰富的空间关系和结构关系,即两者在空间与结构方面是不可分离而融为一体的。有的碉楼在正面或屋两角,但都有各层房间与碉楼相应各层相通,两者相邻的墙体,有的共用一墙,有的各墙相隔,中有砌石搭桥相通,理县桃坪寨陈仕名宅即如此。”^{[8] 147} 季富政在其《巴蜀城镇与民居》之“碉楼民居”部分,专门介绍有“江津王宅(回龙庄)”“武隆刘宅”“达县柏宅”“合江李寨”的碉楼民居,形态与安顺屯堡人的碉楼、六盘水岩脚古镇的田家碉、大屯土司庄园的碉楼、松桃张坝堰罗启疆的碉楼,甚为相合。

2. 湘楚民居建筑对贵州民族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酉水、沅水、辰水等流域。其中,铜仁东部、黔东南东部所受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黔南之瓮安、福泉、贵定,遵义之余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几乎从湖南常德、张家界、湘西一带延伸至铜仁之松桃、江口、印江、石阡、玉屏以及黔东南之镇远、黄平、岑巩、三穗,黔南之瓮安、福泉、贵定等地,都是同一形态的“普通木屋”。这种民居的主要特点是:正屋和偏厦都是“有柱有瓜”的榑架;正屋为三间或五间;正屋两头或单头配设略矮于正屋的偏厦。如果仅从房屋的形态看,几乎无法识别这片区域中的哪些区块居住的是汉族、苗族、土家族或是其他民族。二是在聚落近地的公共建筑中,常有飞山庙、天王庙、黑神庙、五显祠等。

3. 江浙、闽粤民居建筑对贵州民族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其中,黔东南之大部,黔南之三都、荔波,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居形态多为正屋的两头延伸出两个或单个偏厦,形成四面倒水或三面倒水的第五立面;房屋的零立面,多采用“天平地不平”的方式,处理成梯级平台,感官上更加与河姆渡“干栏式”建筑样式接近。二是跨越沟渠的交通要道上,多设廊桥。贵州廊桥的形态和建造技艺,与浙西、闽北、湘南、桂北一带的廊桥应是一脉相承。贵州的廊桥,历史久远很是少有,但在“浙闽边陲”的庆元县,“目前境内现存各类廊桥 90 多座,为全国廊桥数量之最。全国有确切纪年、现存寿命最长的木拱廊桥——如龙桥,全国现存单孔跨度最大的木拱廊桥——兰溪桥,全国现存廊屋最

长的单孔木拱廊桥——黄水长桥，全国现存有史料记载时间最早的木拱廊桥——大济双门桥和莆田桥均在庆元县境内，堪称当世一绝。庆元木拱廊桥历史沿革在全国最具连贯性，宋、元、明、清各朝代建造的木拱桥庆元境内均有（这在全国也是独有）。”^[9]¹从时间的位势看出，贵州的廊桥可能是江浙闽粤一带传入的。

4. 徽派建筑对贵州民族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全省徽派建筑，面积较广。最为典型的是镇远县城、黄平旧州等，可以说是徽派建筑的城镇。

四、族群关系史的信息

（一）民族村寨的选址映射着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少数民族的生存境况

当下所说的民族村寨，一般来说皆是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聚落。其选址活动，发生在两三百年前的时代。虽然时间推移了两三百年，但如果将包括汉族在内的贵州民族村寨所构成的整体格局进行分析，则不难看出，仅选址一项，就有很多的历史故事。这里面承载有国家的战略与意志，少数民族底层群体的适从，少数民族土司土官的无奈与权变，构成一幅绝无虚假的精彩画卷。

以松桃苗族自治县当今辖地的民族村寨总体成局为例。松桃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属于铜仁市，是全国建立最早的苗族自治县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只有苗族、汉族。1982年民族识别工作开展后，新增土家族、仡佬族、侗族等民族。清朝时期，松桃为“厅”，“其制与县同。嘉庆二年以前，松桃厅隶属铜仁府，相当于县；嘉庆二年以后升为直隶厅，相当于府。”^[10]³“《通志》：松桃，明以前俱为红苗巢穴，连接黔、楚、蜀，谓之三不管地。至国朝（清朝），平苗拓壤，始隶版籍。”^[10]¹⁹“松桃在省东八百七十五里，向隶铜仁。山接秀、彭，水通辰、永，舟楫贯通……明永乐十一年置铜仁府，松地尚属苗区……国朝改铜仁总兵为副将，始置营于坡东滑石，坡西孟溪、龙头等地。康熙九年，苗乱，副将贺国贤用兵扑剿，始设营于坡东马颈、报国、正大、马脑、盘石等地，坡西太平、振武、地耶等地。康熙二十年，设汛于坡东哑喇，坡西双凤等地。康熙四十二年，楚苗不靖，提督李芳述剿之，设汛于新寨、麦地、长岭等地。康熙四十三年，平红苗，设正大营……于是附近松桃之地更多新疆……又设汛于落塘、大塘、木树、乾塘、臭脑、岩坳、构皮、康金、盘杂、芭茅坪、大平茶、长冲等地。长冲即松桃故址。雍正十一年，乃移松桃于蓼皋，建松桃城……乾隆初年始行安插……十五年，设塘于坝得地。乾隆六十年……设碉堡于坝得地、凉亭坳、石花、潮水溪、长坪、有泥、陇统、杆子坳、岱东、牛心等地而地日益辟。”^[10]⁷⁶⁻⁷⁷这些记述说明，是明清两朝持续开拓松桃之地，将官军、汉民和“有功苗民”有计划地“安插”，才形成主要沿着“铜仁——大兴——正大——盘信——凉亭坳——蓼皋——老松桃——黄板——天星坡——秀山”的黔川驿道和沿着松江的“茶洞——潮水——石花——落塘——蓼皋——大平——孟溪——乌罗”水路这两条基线分布的大体格局。经过持续两三百年的开拓，具有基桩意义的汉族村寨、苗族村寨得以扎根、发展，并成为汉族、苗族文化交互影响的走廊。在这样的大格局下，官家依托水陆两条干线上的支点性的聚落——营、汛、塘、堡等，在近地向“红苗巢穴”逼近、嵌入，进行进一步的肢解和碎化，到清朝末年，已经完全实现全域性的“定居点”植入和发展。因此，从三五百年的时间尺度来看，松桃的位于官道要冲的规模较大的汉族村寨、苗族村寨，譬如说，川黔驿道上的黄板（苗）、自川、长冲、扒龙、张桂溪（苗）、平茶、黄连、康金、盐厂、地甲司（苗）、大告、马台、官舟等苗寨，黄板（汉）、盐井、镇江、凉水井、张桂溪（汉）、火爆岩、干沙坪、地甲司（汉）、麦地、三保营、报国营等汉族村寨，松江水路重要隘口上的木树、石花、木溪（苗）、红岩等苗寨，晚森、老猴岩、木溪（汉）、落塘、稿坪、大坪、孟溪等汉族村寨，都是国家开辟松桃之地的战略和意志的一种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因被官府打击而逃离原本聚落的苗人对寨子的选址，实际上是被动的和具有再回故地之梦想的行为。比如说，鸡爪沟的龙家寨、石家寨的选址，四龙山、金杠、上潮等苗寨的选址。

在国家开拓松桃之地的两三百年的过程中，土司土官的城堡、官寨、府邸等，因为历史风云变幻莫测，有的被摧毁，有的被迫迁址。明朝时期，居于今松桃大路乡黑坡城的土司，被朝廷军队和近地受欺的寨羊、寨库等寨子的苗民联合消灭，整个城堡被毁；乌罗杨氏土司被朝廷军队打击，全部覆灭，剩下司城，被后来乌罗府接管使用，如今只有城基遗迹和地名。清朝时期，田

氏土司为了配合国家的战略，把如今松桃县城所在地的蓼皋卖给官府，并把土司衙门从云落屯一带搬迁到今松桃世昌乡平茶村，立官寨继续经营，一直沿袭到清末；雍正年间，田氏土司又被迫卖掉苗语称作 raxgibwublel 的官寨，用来建造盘石城，自己搬到苗语叫作 ghobgad 的黄连苗寨，艰难图存；地甲司龙氏土司被废除后，其司城所在地如今演变成为苗族、汉族和谐相处的地甲司村。

在国家开拓松桃之地的两三百年的过程中，由于朝代更替和地方政治军事力量发生变化，一些苗族土官、地方豪酋崛起，官府曾经占据的部分地盘后又失去控制，成为苗寨或苗汉共建的村寨。比如，蓼皋镇的落塘、稿坪、相连洞，世昌乡的龙亭、金杠、道水，长平乡的柳娃、枸皮，盘信镇的马台、麦地等。

类似于松桃的民族村寨选址受到国家战略深刻影响的地区，在贵州应是多数。正因为如此，贵州少数民族村寨与汉族为主的城镇、传统村落，在空间位置上存在某种线性的密切关联。将民族村寨与城镇和汉族传统村落同时标注在贵州地图上，就会呈现出国家开拓贵州之地三五百年历程的战略策略。这是以贵州民族村寨为代表的从选址上体现出来的总体格局，这一格局代表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成就的民居、公共建筑和城堡、官寨等是以当年官府树为建造标准的汉族建筑文化为模范的。

在官家实施的涉及区域性民族村寨布局的方略影响下，经历两三百年的适应性演变，先融入国家体制的民族村寨，同后融入国家体制的民族村寨，彼此的文化认同感日渐疏远；早先融入国家体制的民族村寨，大部分居住者逐步丧失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乃至身份，成为认同和使用汉族文化的少数民族；而一些嵌在少数民族文化能量较强区域的汉族村寨，部分居住者变成了认同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汉族。

（二）规模较小又不在水道和驿道沿线的民族村寨也受历史事件的深刻影响

所谓规模较小即如今仍然仅有百十户人家的民族村寨的形成，大抵有三种初始条件：

一是其始祖为了躲灾避难遁入山林，因得到某种“异象启示”而选址建造居室，经历一两百年时间，人丁繁衍，形成寨子。比如，松桃苗族自治县鸡爪沟村的麻家寨、龙家寨、石家寨，都是雍正年间起义失败后的苗人，为了躲避官府而隐遁到此，立寨安生。

二是其始祖寄居在临近的大寨子里，因生计关系，意外找到别人没有发现的风水宝地，而造居室以存身，此后发达，成为寨子。比如，三都县梅山村水族寨子，据石国义编著的《水族村落家族文化》记载：“梅山村原属荔波县，在荔波北部边境上，现属三都水族自治县，位于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境内的中部，北距县城 47 公里，坐落在亿万山西麓，现是三洞乡定城村的一个水族自然寨”，“相传是由广西北迁定居贵州之潘姓鼻祖潘必旺的 21 代孙潘繖的拓荒地。可能是在明万历年间，繖只身进入深山密林寻地开荒，当他走到现今的梅山腹地时，抬头一望，南面三座紧连的大山恰似一只飞翔的凤凰鸟，凤凰水语叫作‘诺棉’，是大吉大祥之神鸟，懂《水书》识地理的繖兴奋极了，认为天天看到诺棉鸟，是件幸事，子孙必定发达，于是他决定在此垦荒栖身……孝山寨便形成了。”^{[11] 168}

三是其始祖挤走更为弱小的其他民族，占有别人的土地，而后建立寨子。此类情形比较多见，而且多数发生在少数民族起义失败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三都县羊吾村，该村属于三都水族自治县普安镇，位于该镇西北面，距离三都县城 17 公里，面积略为 1 平方公里，有 111 户。其中，定居羊吾最早的张姓有 85 户。“羊吾”是苗语的译音，意思是有水塘的寨子。据该地文人张育才编撰的《羊吾张氏宗字谱》（1994）记载，张氏祖先张均公，因明初随征南将军傅友德征西南夷有功，授合江陈蒙烂土长官司，其子孙世袭土司之职，其中一支名埃公，于康熙元年（1662）迁居羊吾，成为羊吾民族村寨张姓的始祖。他初到时，羊吾这个地方全是森林，并有已然在此的其他民族居民居住其间，这些居民把聚落安置在森林边一个名叫皆朵的地方。张氏祖先在这一带放狗撵山，发现林中有水塘，撵山的狗们经常到水塘里冲凉，上岸时，身上挂有浮萍，于是认为这是好地方，可以开拓，就设计撵走早先定居在此的皆朵人。具体做法是，制作一双 1 尺多长的半旧草鞋，又用大楠竹将自己的屎制作成巨人才

能拉得出来的巨大屎堆，趁夜间放到皆朵人的泉边，让皆朵人认为有巨人或妖物在这一带活动，如不离开必定被其吃掉。皆朵人果然被吓跑了，埃公就占领了这地方并安了家。

属于以上情形建造的民族村寨，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强调隐蔽性，强调利用大山逃生的便利性，强调凭险抵抗的自然优势；二是具有得天独厚的山水的资源，便于上山打猎谋生，就地开凿田亩种植。显然，这是弱势群体在历史境遇和生存经验指引下的正确选择，它同两三百年前贵州少数民族所处的安全形势和生活境况，是一种直接的映射关系。

（三）嵌入性的民族村寨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事件锁定”

在贵州，某个民族的部分人在以另一个民族为主的区域立寨，是比较常见的事情。这种情形，多是历史事件的锁定。它是贵州各民族相互包容的见证，更是民族历史并非线性演进的见证。例如，在黔东南榕江县有一个名叫摆王的苗寨，是东部方言苗族的寨子，四周全是中部方言苗族的寨子。这个苗寨就是乾嘉苗民大起义失败后，突围出来的一部分人嵌入了中部方言苗族聚居区，得到当地苗族的帮助和认同，经两百多年发展而形成的寨子。在安顺西秀区、镇宁自治县，有一些中部方言苗族的寨子，如在黔西南州兴仁县屯脚镇有鲤鱼坝苗寨，四周全是布依族寨子或汉族寨子。这些苗寨嵌入布依族和汉族地区，是因为咸同苗民大起义，一些不愿意参与战争的苗族族人逃离黔东南，到达新的居住地，得到当地人的接纳而建立的寨子。又如，回族在黔西南的普安县青山镇、兴仁县鲁础营乡、安顺市平坝县等有好几个寨子，四周是布依族、汉族的寨子；在铜仁江口县太平乡有一个侗族寨子，四周全是汉族或土家族寨子；在普定县有一个名叫讲义寨的白族寨子，四周全是汉族的寨子；等等都是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造成的。

（四）山屯古堡建设与当地人杰存在密切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朝廷对贵州各少数民族采取的多是不信任、不当数、不尊重的政策，动辄进剿。加上社会动荡，兵匪横行。为了安全，各地的民族村寨，或独自或相邻几个寨子联合，在近地险峻山顶之上建造山屯，在崖间山洞建造洞堡，以便危时存身。而且，建造有坚固的山屯洞堡的村寨，都是因为在当地有深孚众望的杰出人物。山屯洞堡的建造与人杰及其影响存在密切关系。比如，凤岗玛瑙屯的建造，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土匪猖獗非常，此处近地的汉族寨子，有名叫钱青云的团练首领，急公好义，为了寨子和自家的安全，动用家资，请来多地匠人，在马脑山兴建山屯洞堡。此山屯在当地抗击太平天国败军骚扰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于是，周边若干寨子集资加固修缮，作为共同的存身空间。

五、贵州民族建筑文化简史

贵州民族建筑文化，是一种发展着的区域文化。赫章可乐出土的汉代干栏式陶屋，20世纪50年代还在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容易见到的“权权房”，80年代末还在麻山、乌蒙山、腊尔山深处的苗族、布依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落成片存在的茅草屋，作为认知标本，都能够说明贵州民族建筑，从形态与结构到技术与艺术，都不是不变的，也不是沿着某种固定的形态与结构模式进化。一句话，贵州民族建筑文化，从古代到近代，再从近代到现当代以至未来，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这种变化尤其是其中的规律以及促使它演变的动力，对于它的价值认知、价值保全和价值再生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一）发生

代表贵州少数民族建筑史之久远的物证有两个：一是赫章可乐出土的干栏式陶屋和房屋遗址；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至今尚存的干栏式仓屯屋。这两个物证的存在，能够证明贵州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比较久远。

贵州赫章汉墓中出土的干栏式陶屋以及毕节瓦窑遗址发现的房屋遗址，在时间上晚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墓中出土

的干栏式建筑模型，也晚于四川成都三星堆发现的干栏式建筑遗存，更是晚于浙江河姆渡出土的干栏式建筑遗存。

贵州麻山苗族、荔波瑶族等建造和使用的干栏式仓屯屋，与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制干栏式模型，形制相同。甚至，瑶族粮仓为防止老鼠爬到仓内而在楼板与柱顶相接处安放表面光滑的陶罐，在广州出土的干栏式仓屯屋上也可以看见。

（二）发展变化

贵州民族建筑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的迁入和适应贵州生境的过程大体上形成对应关系。

在 1413 年以前，贵州今天的这个版图，实际是一个分别属于四川、湖南、广西、云南的边地状态，没有围绕中心区域聚集发展能力的政治条件、经济基础和文化要求。从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向贵州方向输入的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发展能量到达贵州的腹地时，皆是强弩之末、渠水之尾。因此，相对而言，贵州今之四边——遵义、铜仁、都匀、兴义、毕节，是外部传入的建筑文化之力先期到达的地方，而地理上处于黔之腹地的贵阳、安顺，则处于“冷水区”；明清之前的建筑文化成就，贵州的边地远远优于和多于腹地。最为有名的建筑遗存，如海龙囤、娄山关、南长城、大方彝族九层衙、七星关等，都在今之贵州的边地。

这些情况映射的历史信息，是在建立行省之前，贵州今之版图属于周边各省的共同边地，苗岭山区、麻山山区、乌蒙山区、梵净山区等，存在很多“三不管”之地和难以管控之地，直到清朝中期，黔东南属于亟待开发的“苗疆”。因此，接受或学习“发达地区”的建筑文化与否，在这些“生苗生夷”区或“半生不熟”的少数民族地区，就完全由栖息其间的各民族自主。这样，当地的王者、头人、土司、土官等上层人物，接受外部传入的建筑文化的程度和方式，就决定了某个区域少数民族接受外部传入的建筑文化的程度和方式。贵州边地的建筑形态与结构复杂多样、粗精不一、美丑与共，就是如此形成的。

贵州建省以后，贵州民族建筑文化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明朝，具体时段在朝廷打败了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之后，出于国家政体统一和贵州政治实现结构化之战略目标，打击、肢解、削弱贵州土司政权及其善后时期。这个时期是贵州建立行省后，第一次出现的最为激烈和全面的“革故鼎新”，国家力量同地方力量开展的博弈，播州杨氏土司被消灭、毕节安氏土司被慑服、黔东田氏土司被肢解、黔中宋氏土司被化掉。在这次历史变革中，乌江、金沙江、赤水河、鸭池河等流域内的建筑文化，随着政治体制、经济格局、主流文化和民族人口比例关系的剧变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江西、安徽或托名江西、安徽的商贾、移民、匠人，把当时的汉族建筑文化带入了贵州的大部分宜居之地，并对原有的少数民族建筑进行替代。

第二个时期，是清中叶至清末。清中叶，清廷为了从富有的“苗疆”获得更多的支持战争的财富以击败吴三桂等藩王，巩固中央对西南的实际控制，强力“开辟苗疆”，引发乾嘉苗民大起义、王囊仙布依族大起义和咸同苗民大起义等，战后，黔东南、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地区的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格局几乎被摧毁殆尽，建筑文化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的构建而发生相应剧变。黔东南的苗族、侗族，接受了浙江一带治理官吏及其子弟兵、子弟商带入的浙江特色的汉式干栏式建筑；黔南、黔西南布依族，接受了湖湘一带治理官吏及其子弟兵、子弟商带入的湖湘特色的汉式普通木屋。

第三个时期，是清末至民国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家不再使用歧视和迫使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的政策，同时，不断有沦陷区的机构、商贾、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为逃避战火遁入贵州，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营或求生，加上少数民族有大量人士参加抗战，掌握利用碉堡、战壕等工事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技巧，并把这些战争知识运用到民居、聚落的建设中。于是，在贵州多个民族的民居和聚落，就拥有了碉堡与民居联体的工事性院落，比如，安顺本寨的杨家大院、松桃张坝堰的罗启疆老宅等。

第四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全解决了千百年来民族地区社会得不到长期安定的问题，民族地区的古城、古镇、古村落，都拆除了以前用作防御工事的城墙、围子，有的地方还拆掉碉楼、屯楼、屯城等，聚落的外围再也不设闭合的高墙，群众可以自由地、放心地在原来的围墙之外建造房屋。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民族聚落的自由之美、自然之美才得以生成，并以其不无掩饰的自信呈现给观赏者。换一个角度说，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民族聚落的那种自由与无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适应性发展形成的，是少数民族群众没有说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获得感所释放出来的。

六、结语

贵州民族建筑，对于使用者个体来说是功能建筑。但是，对于民族历史来说，则更多是主题建筑，是无意中留存下来的历史物证。

站在可以真切看见历史的角度，观看贵州民族建筑的整体，容易发现，它今天仍然闪烁的复杂之美、和谐之美，是国家力量和地方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相互消长和相互适应中形成的，是历史变迁在建筑上达成的相互承认和相互趋同。无论是以什么理由来到和居住在贵州这片山地的人们，都在建筑上赋予了宽容、和解、共生、互助的祈求。因此，贵州的民族建筑没有显见的傲气、霸气和杀气；蕴藏在贵州民族建筑之空间与形式的历史意绪，映射到审美的界面上，都是着力彰显和善、质朴、自由、轻松的美；贵州民族建筑宏观上的美是历史引动的经济社会变迁之力叠加作用形成的，微观上的美是匠作的刻意创造和使用者的着意表达形成的。

参考文献：

- [1] 杨洪文. 贵州彝族建筑文化研究 [R]. 贵州省优秀科技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项目结题报告, 2015.
- [2] 余宏模. 彝族扯勒部大屯土司庄园建置考 [J]. 贵州文博, 1992(2).
- [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建筑志 [G].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 [4] 王振复. 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5] 戴志忠, 杨宇振. 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6] 乐嘉藻. 中国建筑史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
- [7] 黄才贵. 贵州民族文化论丛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 [8] 季富政. 巴蜀城镇与民居 [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 [9] 中共庆元县委宣传部编. 中共廊桥之都 [G].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
- [10] 松桃厅志 [G]. 龙云清, 校注.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6.
- [11] 石国义. 水族村落家族文化 [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7.